

# 第一章 20 世纪体系的动摇和日本经济

## 1. 告别战后

历史会以浓墨记下 1989 年和 1990 年。因为在这期间 东欧解体，马耳他岛上的美苏首脑会谈使美苏迈出了从对立走向合作的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左右世界秩序的美苏对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东欧解体发射出很大的震波。由此不难看出这一变化是由于 1985 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推行改革、透明政策，采用新思维外交的结果。如果说“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经过 30 年在最近几年里至少在量的方面消费物资日益增多。对一般市民来说除了必不可少的部分粮食之外已享有了‘不买的自由’”<sup>[1]</sup>的话，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其实，苏联经济并不仅仅是“短缺的经济”而是短缺和过剩同时并存的。一方面，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商店里沙丁鱼罐头铺天盖地，但另一方面肉食品却十分奇缺。西红柿虽多却没有像样的<sup>[2]</sup>。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民行使“不买的自由”权利，尽管市民需求的物品十分紧缺，但是，人们仍不愿意为了摄取蛋白质而用沙丁鱼来取代。一旦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多样化实现之后，依靠单一计划是不能保障满足消费需求的。正确地把握有关消费的信息需要巨额费用，而且，将其整理成有助于完善供给条件的信息并加以传递也同样必须付出代价。关于这点，从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日本的百货商店、廉价批量销售店、专卖店、特价店等都致力于频繁地变换商品花色，向消费者发出信息，同时从消费者的购买活动中把握这些信

息。

市场的重要功能是处理、传递信息。被消费的物质和服务越多，这种功能的效用越大。作为计划对象的物品和服务项目为十种时 姑且不论 如增加到一百种、一万种、一百万种 就是使用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也要花费几乎相当于地球年龄的时间，才能得到最佳组合配方。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指出，引进市场机制并不是盲目地采用一个特定的模式。因为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概念( various concepts)<sup>[3]</sup>。他的讲话表示了在这样的领域里 以什么速度来引进市场机制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域理解为面向最终消费的物质和服务的领域。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对公共所有比例较高的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经济所表现出的强烈关心体察到。很显然，苏联和西方各国的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互相对立的经济体制间的关系了。在那次采访中，戈尔巴乔夫还明确指出，随着美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和相互理解的加深，“冷战已成为过去”。至少 难以想象历史发生倒转、以东西冷战形态左右世界秩序的时代会卷土重来。因此，20 世纪体系的制约条件发生了巨变的 1989 年、1990 年，就成了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sup>[4]</sup>。

## 2. 欧洲联盟和东、西德统一

东欧各国急速发展的体制变革之波，促成了东、西德统一这一戏剧性变化。东、西德分裂状态 是东、西对立的象征。两德在 1990 年 7 月统一了通货，继而超乎预料地在同年 10 月又迅速实现了国家统一。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而且 统一后德国将在 1992 年以后的欧洲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式开始组建欧洲联盟是在 EC（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制定

的《区域内市场白皮书》于 1985 年被欧洲部长理事会承认之后。

《区域内市场白皮书》制定了数百个新法令。这些法令旨在消除 EC 区域内的非关税壁垒，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制度一体化，进而在 1992 年底创出一个真正统一的区域内市场。业已制定的单一欧洲议定书，相继被各成员国批准，并于 1987 年 7 月开始生效。

欧洲联盟消除了物理的、技术的和关税方面的壁垒，经济活动的效率得以提高，人们期待 EC 的 GDP 有 4%~7% 的增长率。不过这一尝试限制了经济制度的主权，无疑会遇到各种抵抗，也会听到许多噪音。但是正如 EC 委员会副委员长科费尔特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已没有人会怀疑建立区域内市场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的重要性。”不用说企业，就连州、市一类的地方政府，也都在以 1992 年的欧洲联盟为既定方针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如何顺应欧洲联盟建立后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同时，欧洲联盟也是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在论证有关欧洲联盟经济性效果的切基尼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描述，特引用如下<sup>[5]</sup>。

1) 在高科技领域中，EC 之所以落后于美日的最大原因，在于市场分散。

2) 即便是 EC 中的大国，姑且不用说与美国相比，就是同日本相比也只不过是拥有一个很小的市场。而且，EC 区域内贸易规模小，市场被分割，所以 EC 电气通信机器产业竞争力不断衰退的状况，就不足为奇了。

报告还指出，在高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中，EC 市场的分散，导致他们较之美国、日本处于劣势地位。高科技部门的发展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这一点看，促使建立欧洲联盟的幕后主角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了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与美国和日本抗衡，使 EC 得以发展，建立区域内市场已势在必行。

关于欧洲联盟建立后的作用 切基尼指出：“由于美国的赤字、美元市场的不稳定及美国经济衰退等阴影的笼罩，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可信赖的区域。人们期待有活力的 EC 市场，能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对其他缺乏活力的市场和国民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这种看法说明了美国的中心作用被削弱，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从而希望 EC 能代替美国，或者能和美国发挥同等作用。所以，欧洲联盟的建立向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

### 3.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意义

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提出挑战，可以说始于 20 年前，其焦点集中在通货价值的稳定，特别是作为国际通货美元价值的稳定问题上。1968 年在采用黄金双重价格时，西欧各国在支持美元价格稳定的同时，转向要求美国政府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并得到了实现。另外，他们还决定将同年创设 SDR（特别提款权）与美国政府停止轰炸越南北方挂钩。条件是西欧各国在创设 SDR 上作出让步，迫使美国政府同意停止越南战争。

如果把 20 世纪体系定义为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那么上述事实便可以说反映了这个体系开始动摇。但是在 60 年代后期，这种动摇还是轻微的。为了稳定国际通货的价值，中心国家美国最终采用了可能招致经济萧条的政策，承担了国家威信下降的风险。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美国做出作为中心国家应该具有的节度。

1971 年到 1973 年，国际通货制度中的固定汇率制<sup>[6]</sup>被废置，各主要国家先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经过 1973 年到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供给休克后，20 世纪体系有了更深层的变化。对环境变化反应迟纯，并在不断衰退的中心国美国企图改组 20 世纪体

系，而预测到美国已难以履行其中心国家义务的西欧各国也萌发了重建这一体系的思想。其象征就是从 1975 年起由七个发达国家——美、日、联邦德国、法、英、意、加 外加欧洲共同体首脑参加的每年一次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

不过 关于首脑会议 ,S. 马利斯曾严厉地指出：“首脑会议召开以来 11 年间 失望的情绪不断蔓延。”其理由是 它“作为最高政治首脑们讨论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场所的作用已明显减少”<sup>[7]</sup>。马利斯期望首脑会议能发挥超越各国政府的政策主体的、或者是调整宏观经济的协调机关应有的作用。但由于这些期望的落空，故使马利斯对首脑会议作了否定的评价。但从货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这种期望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sup>[8]</sup>。本书将以与这种期望完全不同的观点，即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是如何展示了 20 世纪体系变化这一观点出发来进行考察。站在这种立场上，就不得不事先附加一句：如果马利斯的期待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与 20 世纪体系异异的另一个世界体系。

首先应该注意到，首脑会议是美国政府或是接近美国政府的人所构思的<sup>[9]</sup>。它意味着美国政府在通货问题、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方面，自己制定规则让其他国家遵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只凭美国的构思是无法使首脑会议召开的。因为 70 年代初 法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构思，直到吉斯卡尔·德斯坦就任法国总统后，采取主动 从 1974 年底到 1975 年初，经过法国政府的不断协调，才使首脑会议得以召开。同时，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合作也是首脑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关于恢复固定汇率的要求持有强烈戒心。为了缓解美国的戒心，施密特极力主张让日本加入首脑会议议员。也就是说，在首脑会议筹备过程中，欧洲取得了主动权。

首脑会议的最初宗旨是：由发达国家首脑参加，在十分有限的少数人员之间，非正式地讨论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加深共识，

以利于各国政府间的政策调整。在有关对付国际通货制度的混乱和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及高失业率、经常性赤字等对策上，可以看到各国政府间都在力图避免陷入所谓的“囚徒的悖论”[译注 1]。

当然，当初法国政府是要尝试解决国际通货问题，而美国政府不仅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把安全保障问题也联系起来，以此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另外，美国卡特政权时代的 1977 年和 1978 年，在伦敦和波恩召开的两次首脑会议上都共同实施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这是两次解决问题的首脑会议。会上联邦德国和日本承诺实施振兴经济政策，美国也承诺要抑制通货膨胀，此外还就为促进 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东京回合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是，以上这些具体政策性协调得以实施的事例，却是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马利斯才深为不满。于是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美国的里根政府，日本的中曾根政府，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等保守政权接二连三地纷纷登场，他们都十分看重市场机制，所以对政府间的经济政策调整也就不感兴趣。

重要的是，首脑会议这一形式制度化以后，各成员国政府为了互通准备在首脑会议上需要讨论的课题而举行的协调作业得以延续下来。各国政府在深化互通信息的基础上，也加深了对其他政府政策布局的理解，便于一国政府在采取以国内条件为基础的某一政策时预测到将会在国际上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其他国家会采取

[译注 1] 博弈论 (game theory) 是当面对有自己策略的对手而必须选择最优策略时使用的一种理论。囚徒的悖论 (prisoner's dilemma) 是这一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囚徒的悖论指两名博弈者都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时，其结果可能比采用对自己不利的战略时的结果要坏，并且在零和博弈 (即损益合计为零的博弈) 中这种悖论不会消失。要消除这种悖论，就必须在非零和的博弈中修正“对自己有利”的看法。参见 Anatol Rapoport and Albert M. Chammah, *Prisoner's Dilemma: A Study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Longmans Canada Ltd. 1965.

何种行动等。这就是第五章中提到的 1985 年以后的西方五国间政策协调的前提条件。

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贸易依存度有所提高，资金的国际间流通日趋活跃。企业的跨国公司化得到推动，经济的相互依赖更加深化。正因为如此，低增长等经济困难的出现，使民族主义又开始抬头。与 30 年代所不同的是，首脑会议的存在起到了阻止民族主义对经济合理性的破坏作用。首脑会议告诉人们，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已被调整为一种必须借助欧洲诸国和日本的支持与合作的秩序。

## 4.20 世纪体系的构成

这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20 世纪体系<sup>[译注 1]</sup>这个术语。这里的体系意思是指国际体系（system of states）。因为叫作体系 所以就不仅仅是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集合<sup>[10]</sup>。也就是说 我们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有结构性关联的整体叫做国际体系。因为它诞生于 20 世纪 所以叫作 20 世纪体系。结构性关联意味着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处的地位和其功能各有所异，并在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20 世纪体系不是主体型及世界帝国型体系，而是非主体型体系。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军事机能发挥巨大作用的世界帝国型体系相比，20 世纪体系与 19 世纪体系一样作为近代体系的特征是经济因素在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从经济角度来说近代体

[译注 1] 田中明：《世界体系》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把世界体系定义为“在地球上存在的社会系统中，在一个系统之上不存在更高级的社会系统的最高级社会系统”同时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系统一定会覆盖全球。世界系统分为两种形式 即主体型世界系统和非主体型世界系统。所谓主体型世界系统，常常是以国家形式出现。如古代中国、罗马帝国，以及幕府制度下的日本，都成为一个主体型世界系统。由一个国家以上的主体组成的世界系统是非主体型世界系统。如现代社会非主体型世界系统由中心国家、核心成员国家、周边国家组成。

系的特征就是主要构成要素，即主权国家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 同是近代体系 20 世纪体系和 19 世纪体系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 20 世纪体系的包涉范围狭小，而更重要的是以苏联为中心，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这一体系间的对立关系。所谓东西对立，就是指这种世界体系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虽然时紧时缓，但正因为这种对立的存在，旨在维护这一体系的新的军事机能才得以展开，为了维持、扩大这一体系，外国援助这种政治机能才被迫加了进来。

另外 在 19 世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sup>[11]</sup>的主权国家对周边国家行使了世界帝国型的殖民统治。在 19 世纪体系崩溃前夜的 20 世纪初 正如 J. 霍普逊在《帝国主义》中所描述的那样 以英国为首的核心成员国统治着广大的地区和那里的居民；与此相反，在 20 世纪体系中 殖民地纷纷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成为主权国家。核心成员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已不再是世界帝国型的了。就周边国家在政治上的自立而言，国际性的大众民主主义化便成为 20 世纪体系的特征<sup>[12]</sup>。

在 20 世纪体系和 19 世纪体系中，核心成员国的生产方式虽说是资本主义的，但其构成原理却大相径庭。本书把 19 世纪体系这一时期叫做“前期资本主义”把 20 世纪体系这一时期叫做“中期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加藤荣一的论述简明扼要，现引用如下<sup>[13]</sup>：

“ 产业结构——棉纺工业、煤炭工业为主体 → 钢铁、以石油为基础的重化学工业的多极相关产业；

产业组织——个体企业 合作经营 自由竞争 →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大型商业企业和垄断所带来的市场组织化；

阶级关系——以契约为基础的自主性资本—劳动关系的

形成 旧中间层的分解倾向 → 团体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出现，新中间层的形成及保留部分旧中间层的政策 → 阶级关系的利益集团化，法人主义。”

写在“→”前面的是‘前期资本主义’的特征 写在“→”后面的是“中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再稍加整理的话，就应该是②区分了企业和产业组织。关于企业，资本家兼经营者的个人企业 → 资本家和经营者的分离。而“→”后面应该加上 大众登上舞台 使大众消费取代了阶级消费。这种资本主义构成原理的不同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这里再引用一段加藤荣一的文章。

统治机构 —— 通过有限的选举产生出的有产阶级的独裁，由有产阶级维持的地方自治 → 由男女普选制产生的大众民主主义、法人主义，生活的社会化、平等化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化 = 财政调整制度的出台。

⑤ 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 国家在经济上力图保持中立 完善组织结构条件的行政革命 相对意义上的‘小政府’的实现 → 由货币管理，财政政策产生的总需求管理，有关管制及公共企业等国家规定、国家福利化带来的生活的社会化，‘大政府’的出现。

重要的是政治上出现了大众民主主义后，政府加强了对行政、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干预。虽然组成 20 世纪体系的主权国家政府，不得不在采取符合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行动的同时，兼顾符合国内大众和利益集团的要求。然而使两者互相背离的实例也曾有发生。譬如在本 20 世纪体系前期的 30 年代 因为重视了后者，所以没有能够形成体系。直到 60 年代初期，20 世纪体系借鉴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开始重视前者，但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在重视国内条件的程度上也是有差别的。从周边国家到核心成员国，然后是中心国家，越接近中心，从体系中获得的自由度也就越大。这与后述的为维持这个体系所负担的费用的大小呈同一顺序。

以上我们以主权国家为构成单位叙述了 20 世纪体系 但地域

性的次级体系如 EC 虽然是根据不同机能加以划分的 但超越国家主权范围一直十分活跃政府间国际组织（如 OECD 大量存在的事实也是 20 世纪体系的一个特征。这与 20 世纪体系有意识地创造旨在使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制度紧密相关。

## 5. 中心国家美国的衰退

C. 金德伯格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存在能够稳定世界经济的国家（a stabilizer），而这个国家又必须是一个国家（one stabilizer）。”这个国家要为“全体利益负责”<sup>[14]</sup>（the provision of the public good of responsibility）。这就是所谓霸权安全论的典型见解。毫无疑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扮演了这个角色。

在 20 世纪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最早的举措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创立。但是，从有目的有意识地形成这个体系来说，明显地表现在军事上的组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刚停，美苏两国围绕对柏林的封锁等问题从大战中的合作伙伴关系转向了对立，从而形成了 20 世纪体系的初期条件。

由于体系间的对立，所以体系的组建维持都是围绕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保障以美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而展开的。1949 年西欧各国和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建立了 NATT（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共同防御组织。接着在 1952 年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美国和日本之间也相继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美国与菲律宾也结成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以美国为轴心，缔结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相对抗的同盟。

这个同盟与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后，经过维也纳会议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迥然不同。它之所以得已维持是由于同盟

是以保护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为共同目的。与此相反在 19 世纪体系中，针对帝国型的次级体系的主体，即欧洲大帝国间同盟关系的合纵连横及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对海洋超级大国英国为一支打击力量来取得平衡的。

同盟关系的持续性加之在这种持续关系的基础上围绕防御领域而形成的国际分工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美国承担了维持 20 世纪体系的决定性责任，负责清除所有对苏防御及给同盟各国带来麻烦的因素。美国的分工是部署核武器、ICBM（洲际导弹）、SLBM（潜艇导弹）、战略轰炸机和以核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机动舰队等战略军事力量，而其他加盟国则分担与驻守美军一起加强保卫本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如拦截战斗机、地对空导弹、坦克等。

这种分工关系，随着英法开发核武器，瞄准超级大国美国在军事大国化上稍有修正之外，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在体系间的对立和军事问题方面，包括核心成员国在内的加盟国的主权是由美国支配的，这就是核保护伞的内涵。

但是，这种分工关系意味着美国承担了维持 20 世纪体系的费用支出。以 1970 年为例，美国的国防支出达到了北约各国国防支出总和的  $\frac{3}{4}$  超出第二大国防支出国 10 倍以上。与核心成员国人均国防支出相比较，美国要高出 2 到 4 倍<sup>[15]</sup>。美国的国防支出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8.8%，在北约各国中独占鳌头。这个比率，除了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等中东热点地区及苏联、中国、朝鲜外，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 20 世纪核心成员国中，美国的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所占比率之大，与福利型国家英国、企业型国家日本相比，可以说美国具有军事型国家的特征<sup>[16]</sup>。

体系维持费的承担，从西方同盟的立场来说，“是为了谋求体系的利益负责的”。至少到 60 年代中期即越南战争陷入僵局为止，美国国内普遍认为这种高额国防支出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sup>[17]</sup> 因为它促进了经济增长 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然而 截止 1973 年石油危机这一段时期内，军事费用负担比率越高的国家，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设备投资的比率、生产的增长率及经济增长率都呈低势，也就是说国防支出高比率的美国背上了经济增长缓慢的包袱。

另外 在军事国家美国的研究开发费用中 国防部的支出占了近 40%，而军事、宇航等高精尖技术的开发并没有在提高民间技术水平上发挥多大作用。正如 R. 狄克拉斯指出的那样：“并没有产生抛出效果。”[译注 1]

在上述军事方面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分工密切相联的维持体系的另一个手段，即外援，特别是政府援助。大规模的外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美国政府从 1946 年起 每年提供 40~60 亿美元的外援。因为外援的资金来自国民的税收，所以不断遭到纳税人的批判。然而，美国政府却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时常变换他们施行外援的理念，使之维持下去<sup>[18]</sup>，并以此来发挥中心国家的作用。

外援是直接把物资、服务、资金提供给受援国家 是所得的国际转移，所以它具有要么把国际通货提供给受援国家，要么帮助受援国家节约国际通货的效果。但是，美国的外援不单是高所得国家向低所得国家的所得转移和提供国际通货，它还具有维持 20 世纪体系这一机能。

40 年代后半期的外援，正如马歇尔计划及对日救济基金那样 是用于支援战争受灾国重建资本主义的。换言之 是援助 20 世纪体系核心成员国的复兴。

到了 50 年代，外援在相互安全保障法 (Mutual Security Act) 的基础上，具有了加强安全保障条约关系的机能，是一种“军事色

[译注 1] 抛出效果 (spin-off) 亦可译作抽资摆脱，经营术语。即一个企业把它的一部分资产转移给一个新成立的组织，用来交换后者的股票，然后将股票作为一种财产股息分配给原来公司的股东 罗森堡：《工商与管理词典》1989 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这里是指美国的尖端技术没有能够直接带动美国产业的发展。

彩很强的‘支持防卫的援助’<sup>[19]</sup>。外援的主要对象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希腊、土耳其 然后就是韩国、越南、老挝以及台湾等 集中在与苏联阵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sup>[20]</sup>。所以说外援具有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保卫体系的机能。

但是 至少到 50 年代为止 美国政府的外援 从美国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单纯地负担费用支出。凭借这些外援，或者是美国政府直接从国内购买武器、粮食或者是受援国从美国企业购买物资，其结果是产生了扩大美国国内需求、增加了就业机会的经济效果<sup>[21]</sup>。当然，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效果只有在美国产业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超额储蓄不断持续等条件得以满足时才得以生效的。

进入 60 年代后，美国的两国间外援方式有了变化。这是因为东西对立在经过朝鲜战争这一热战之后产生了和平共处的气象，而纳税人对外援效率的评价也变得尖锐起来。此外 到 50 年代末，以往的美元不足以升级为美元危机，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保护美元政策。这也是影响美国的两国间外援方式变化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从战争灾害中复苏的欧洲各国，特别是法英两国重新开始对旧殖民地实施政府外援，恢复旧势力范围，这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来说无疑是一抗衡因素<sup>[22]</sup>。

在上述这些条件的变化中，1960 年联合国宣布了“10 年开发宣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为了调整外援，以美国为主导，OECD（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设立了 DAG（开发援助组织）。1961 年 OEED 改组成 OECD（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下设 DAC（开发援助委员会）。DAC 是以美国为主导、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协作的协调机构。当时美国的两国间援助从依靠军事援助实现周边各国的安定，演变成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安定，并在与西方各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协作。DAC 的首届主席 C. 里德巴克（美国）在最初的年度报告中，明确要求

“更公平地分担援助的负担”<sup>[23]</sup> 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外援的推移看主要援助国家的分担比率，如表 1-1 所示，十分明显，60 年代 DAC 各国的援助占压倒多数的比率。50 年代以美国为主体，加上法英的援助额，则与 DAC 各国的援助总和几乎相等，但进入 60 年代，美、法、英三国的援助减少，日本、加拿大、联邦德国的援助有所增加。由此可见，“更公平地分担援助的负

表 1-1 外援的变迁

(单位:百万美元)

援助国	年度				
	1950/1955	1960/1961	1970/1971	1975/1976	1983/1984
美国	3 961	8 689	7 045	7 037	8 236
	50.2	46.2	30.8	21.7	22.2
法国	2 325	2 827	2 450	2 659	3 939
	29.4	15.0	10.7	8.2	10.6
英国	888	1 605	1 523	1 583	1 578
	11.2	8.6	6.7	4.9	4.3
联邦德国	193	1 213	1 684	2 149	3 108
	2.4	6.5	7.4	6.6	8.4
日本	67	558	1 568	1 794	4 027
	0.8	3.0	6.9	5.5	10.9
意大利	183	270	409	325	1 009
	2.3	1.4	1.8	1.0	2.7
加拿大	91	212	885	1 346	1 544
	1.1	1.1	3.9	4.2	4.2
DAC 合计	7 875	16 304	17 845	20 480	28 433
	99.7	86.9	78.1	63.3	76.8
OPEC	—	—	1 053	8 980	5 027
			4.6	27.8	13.6
苏联阵营		1 855	2 590	2 165	3 135
		9.9	11.3	6.7	8.5
世界总计	7 897	18 765	22 837	32 343	37 049

注：各国栏上行是 1983 年价格，是根据汇率算出的数据，各国栏下行是占世界总计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 Twenty-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985, p. 93.

担<sup>[23]</sup>”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落实，高增长国家开始负担体系的维持费用。然而到了 70 年代，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作为援助主体开始登上舞台成为新的抗衡因素。由美国负担的部分费用也逐渐被日本和联邦德国所取代，对日本来说，这笔援助既不是体系的维持费用，也不是受援国家的利益，只不过是日本企业的利益所在<sup>[24]</sup>。所以这一点被指责为有损于体系，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霸权稳定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上述变化表明 20 世纪体系已开始出现波动。

## 6. 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

综上所述，20 世纪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有目的有意识地形成的，同样，被称之为 20 世纪植物神经系统的市场机制也需要人为性制度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GATT（关贸总协定）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村上泰亮在谈到 20 世纪体系的特征时，曾提到过“IMF、GATT 中所反映出来的国际经济制度<sup>[25]</sup>”这一点。

村上指出，如果没有“超级经济大国”，国际经济制度就不能启动。他认为：“如果在固定汇率下实行自由贸易的话，那么巨额赤字国家的经常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有必要时具备以资本输出来挽救赤字国破产能力的超级经济大国（或由超级大国支撑的国际组织）的存在。若非如此，国际贸易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即使是经济收支顺差的国家也同样需要可以保证提供维持顺差所必需的、稳定的金融资产的超级经济大国。”这个经济大国就是美国，而国际组织就是 IMF 等。

IMF、GATT 是以实现外汇及贸易自由化为目的成立的组织机构。抽象地说，是在多边的自由国际贸易中，参与国可获得贸易利益，而且为使国际贸易发展，采取的措施就是稳定通货价值和引

文中的“固定汇率”。

众所周知，设立 IMF 之际，在 1942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的凯恩斯方案和美国的怀特方案互相对立<sup>[26]</sup>。凯恩斯的清算同盟 (Clearing Union) 方案主张废除黄金货币，由清算同盟来接管成员国的债权和债务，并将结算计算单位称为大额短期融资，允许债务国透支，当透支超过一定限额时，汇率就自动下调。这是债务国英国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而又不致导致萧条的一项筹划。与此相反，怀特的安定基金 (Stabilization Fund) 方案主张承认黄金作为国际通货，认为成员国义务负责维持本国货币的固定汇率，也就是人为地重建限定的黄金兑换本位制，从而使通货价值稳定，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结果，怀特方案被采纳。究其原因，既有对 30 年代汇率竞相下调破坏了多边贸易的反省，也有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得以维持这一体系实力。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占世界 GDP 的 40%，世界黄金储备的 60% 集中在美国通货当局手中，并具有维持黄金汇兑 (美元) 价值的足够的储备。而且，IMF 成立后，尽管预计到会出现村上所说的“经常收支赤字国”而及时建立了紧急融资制度，但基本上仍是以“赤字国”的责任和努力来维持通货价值的。

GATT 是因美国政府提倡的 ITO (国际贸易组织) 未能成立而作为次善之策缔结的协定。该协定在美国并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只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才被认可的。但是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GATT 在降低关税、废除贸易限制等国际交涉中发挥了作用。

1947 年以来，GATT 实现了关税减让，其中最大的成果是 1964 年至 1967 年的肯尼迪回合<sup>[27]</sup>。美国的肯尼迪政府在 1962 年制定了通商扩大法，从而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主导权。具体来说，在 GATT 回合中，关税比 1962 年下调了 50%，使撤销关税率低于 5% 的产品关税成为可能。美国政府认识到原有的、采用报价方式进行双边谈判的方式会使关税的降幅变小，因而

试图引进统一下调方式来促使关税大幅度下降。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成功的，占世界贸易 80% 的 53 个国家同意把关税平均下调 35% 使相当于世界贸易  $\frac{1}{4}$  的 6 万个品种、400 亿美元的贸易受到影响。

于是 IMF、GATT 这些旨在维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相继问世，市场机制得以运转。就这点而言，20 世纪体系与自发产生世界市场的 19 世纪体系是截然不同的。

## 7. 20 世纪体系的动摇

从 19 世纪末开始以汽车、石油化工、电子工业为舞台，巨大的技术革新浪潮在美国兴起。在推动这一浪潮的美国企业中确立了美国式生产方式，关于这点下面将要论述。新的耐用消费材料被不断地开发出来，生产率的提高和大众消费的扩大齐头并进。这场技术革新是 20 世纪体系的原动力，它被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吸收后，实现了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高速增长。“黄金的 60 年代”是 20 世纪体系的顶峰。

但是，顶峰意味着波动的开始。20 世纪体系中潜在着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在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开始暴露出来，这也是前面论述中涉及的核心成员国向中心国美国提出质疑的原因之

第一个问题是在 IMF 中出现的。那就是早在 50 年代就被指出过的流动性悖论（特立芬的两难推理）。如果在世界贸易中需要有一定的流动性（以通货流通速度不变为条件），那么就必须以与世界贸易增长率相等的增加率来提供流动性。在当初的制度下流动性是以黄金或者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来支撑的。因为 1 盎司黄金等于 35 美元的比价被固定下来，所以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就会影响黄金生产，引起黄金供给不足。但如果应用 50 年代末 A. W